

同济外语学术论丛

翻译美学理论

Translation Studies:
An Aesthetic Perspective

刘宓庆 著
章 艳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同
济
外
语
学
术
论
丛

翻译美学理论

**Translation Studies:
An Aesthetic Perspective**

刘宓庆 著
章 艳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美学理论/ 刘宓庆、章艳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3

(同济外语学术论丛)

ISBN 978-7-5135-0691-5

I. ①翻… II. ①刘… ②章… III. ①翻译理论: 美学理论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4765 号

出 版 人: 于春迟

责任编辑: 杨天天

封面设计: 覃一彪

版式设计: 涂 俐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20.75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0691-5

定 价: 49.90 元

* * *

购书咨询: (010)88819929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 (010)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206910001

“同济外语学术论丛”编委会

顾问：顾曰国

主任：马秋武

编委：张德禄 朱建华 李扬 吴侃 吴建广

说 明

本书导读及第十一章由章艳撰写，
其他部分由刘宓庆撰写。

总序

凝结着同济外语学人辛勤劳作与智慧结晶的《同济外语学术论丛》即将陆续出版了。这套论丛不仅仅是近年来当代同济外语学人学术研究的成果汇聚，更是百年同济人文研究薪火相传的历史延续和见证。

同济大学人文教育与研究历经沧桑，源远流长。早在1914年，后来成为美学大师的宗白华入读同济医工学堂，1915年有了法政科毕业生。“五四”时期，同济人的文学创作和学术探讨更是颇具影响，如在“五四”前诞生的“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中，魏时珍、宗白华等同济学生曾是《少年中国》月刊的主要撰稿人。1927年秋天，诗人殷夫考取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半年后即翻译出裴多菲的名诗《格言》，成为当时的高材生。1936年，冯至和杨晦先后任教于同济，冯至任德文教授兼附中校长，40年代初西迁昆明时才转入西南联大。1945年，同济大学正式设立法学院。1946年，从四川返沪后即准备创建文学院，先扩理学院为文理学院，增设哲学、外国语文学、中国文学三系。1948年文理分院，文学院增设历史学系。至此，同济大学已构建起由理、工、文、法、医五大学院组成的综合性大学的完整框架体系，并聚集了一批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人文社科学者，如中文系主任郭绍虞，哲学系主任熊伟，外文系主任陈铨，历史学系主任吴萍，法律系主任吴歧等。另外，章士钊、郑寿麟、杨一之、陈康、冯契、廖馥君等著名教授都曾执教于同济。

50年代初院系调整，同济大学文学院、法学院等先后转入复旦。外国语文学系最先于1949年迁入复旦，而后部分教师转至南京大学。经过这番院系调整，同济大学原有的文、理全部学科和医、机、电、船、水利等多种优势学科，连同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全部调出。与此同时，同济大学也汇聚了国内多所院系土木建筑等的学科力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土木建筑等工程类高等学校。

多年来，同济大学的土木建筑在国内外一直保持其优势学科地位，但重建同济文科和医科始终是海内外同济人的一个夙愿。改革开放以来，同济大学实施恢复对德交往和综合性大学的发展战略，文科自然成为学校整体建设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一大背景下，同济外语学科秉承“同舟共济、自强不息”之精神，脚踏实地，认真谋划，积极进取，1998年在原德语系、外语系的基础上组建外国语学院。近年来，在学校鼎力支持下，学院外引内促，全球招聘，贤才毕至，实力弥进。2006年，获批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博士授权点。2010年，又顺利通过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自审，至此形成了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学术型学位和专业性学位兼备的、完整的学位培养体系。

辉煌同济，百年外语。自1907年同济德文医学堂德文科初创，1946年设立外国语文学系，至1998年外国语学院成立，我们一路走来，承继传统，前贤后学，矢志不渝，为建设和发展同济外语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与历史上蜚声学界的同济学人相比，当代同济外语学术研究的水平尚有一定差距，但我们抱定了以学科发展为目标，以弘扬学术为己任的宗旨，近年来随着学院各项工作步入正轨，努力建设与发展同济外语事业已成为当代同济外语学人的共识。《同济外语学术论丛》中的每一部著作都凝聚着作者们的心血、汗水与智慧，都是为实现再铸同济外语历史辉煌这一目标做出的奉献。我们在努力，我们在进步，相信这些成果会得到学界同行的接受和认可，也衷心希望各界学者对我们的工作给予批评、支持和帮助。

是为序。

马秋武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

2011年1月30日于外院汇文楼

中国翻译教育必须彻底改革： 翻译学呼唤“回归美学” (Back to Aesthetics)

刘宓庆（代序）

自从我 32 年前（1978 年初）开始兼教翻译课以来，在大陆、香港、台湾三地的共七所大学和研究院教过从本科生到硕博研究生的多种类型的翻译课程。在中国大陆，近二三十年来社会上几乎年年、处处、人人都说“翻译课要改革”，结果是“年年叫改革，年年没起色”。原因何在？根源何在？我很纳闷。2005 年底我为我的全集出版事宜回国整理书稿，并于 2006 年受聘在上海同济大学教书。根据这些年来的观察，我感到首要的也是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给翻译、翻译学的基本定位或学科归属是错误的。错误的定位或学科归属必定导致偏离翻译和翻译学本质的建制关系以及整体的教学目标、课程设置和学科建设，近几年更衍生出种种错误的功利主义教学思想，并难免提出错误的、急功近利的发展策略。

我先从本身的感悟出发来解释这个问题。上世纪 60 年代我从北大毕业以后进入国家电台做汉英翻译工作，在五年和随后的“翻译苦旅”中，我几乎没有间断地在思考一个问题：“What is translation all about?”（翻译究竟是在干什么？）为解答这个问题，下面我先把我们日常所从事的具体工作——“翻译”（translation）作一番解构，将它拆分成两个阶段、12 项任务，如下所示：

第一阶段 原语（SL）分析 ——

- （任务 1）语言结构分析（按语法析出词句结构）
- （任务 2）语义结构分析（按结构析出意义）
- （任务 3）语段结构分析（从句到段析出意义）
- （任务 4）篇章结构分析（从段到篇析出意义）

-
- （任务 5）文化分析（语言文化内涵及价值判断）
 - （任务 6）修辞分析（修辞审美手段扫描）
 - （任务 7）风格分析（文体特征化手段及行文艺术特征分析）
 - （任务 8）意涵分析（暗含义即语义外延分析、意象、意境及超文本意蕴分析）

第二阶段 译语 (TL) 构建 ——

- (任务 9) 语义定夺及转换的择善从优 (意义的审美优化)
- (任务 10) 句式定夺及转换的择善从优 (句子形式的审美优化)
- (任务 11) 按 TL 审美价值的行文优化 (叙事引文及逻辑的审美优化)
- (任务 12) 按 TL 审美价值的风格优化 (译语文本整体的审美效果优化)

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以上 12 项工作中只有 4 项 (任务 1-4) 与语言学有直接关系,作业时间大约占三分之一,其他 8 项任务 (任务 5-12) 都属于语言审美,实际上与文化研究、语言审美、修辞学息息相关,作业时间占三分之二。因此,很显然,将翻译定位为属于语言学或应用语言学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记得这是上个世纪 50、60 年代由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院许国璋等几位教授定的,这个认知显然受历史条件的极大的限制。当时中国学术界对西方现代语言学知之甚少。我 70 年代末才听到“应用语言学”这个词)。根据这个定位,“翻译”在体制上一一直隶属于外语系或外语学院,由完全不懂乃至有意无意地排斥翻译的人掌管翻译教学和学科发展大计。“翻译(课)”也就必然会被安排在外语系“助阵”,它的功能只是“为打好外语基本功提供一种辅助性实用手段”,有人(我记得是董乐山,我们当时同在北京第二外语学院任教并同住一室)将它比喻为替“外语当家的主学科敲敲边鼓的小伙计”,可以说实在不过分。翻译学科完全失去了起码的自主性。这种情况在中国大陆一直延续了约二十年。进入 20 世纪最后十年,翻译系在大陆纷纷成立,但作为外语科系“附庸”(“vassal”;也可以叫做“appendage”,就是“配件”)的“体制性定位”丝毫未变,外语课在翻译系课表中的支配及主导地位丝毫未变。近二十年来,一些规模化的所谓“翻译研究所”等翻译理论和教学“研究机构”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或因袭成见,或唯西方观念、长官意志和世俗功利是从。在中国的大学里,“专业翻译教育”(作为翻译职业的翻译教学)与“基础翻译教育”(作为外语语言基本功的翻译教学)混为一谈,也都没有什么自主性。

然而,无论如何,时代在发展,人们的认知在发展。

1976 年朱光潜教授在新版《西方美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的序言中写道:“美学由文艺批评、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附庸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时代已经到来,80 年代以来中国的美学热及随后蔚

然成风的学习余波，大大推进了中国人的审美意识、认知能力和是非辨识能力，知识界和学术界则更得益于美学对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的改进。这些积极因素及北大师长对我的启发和鞭策是敦促我在 90 年代中期完成《翻译美学导论》的动力。

这期间很多大师的教导和指引对我的翻译观之“回归美学”(Back to Aesthetics)起着很大的作用，这中间林语堂、朱光潜、王力、卞之琳、高名凯、余光中等人的语言美学立论以及维特根斯坦和瓦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的语言哲学和语言美学立论对我的指引影响尤深。在我看来，对翻译学而言，它的“本体论归属”(ontological affiliation)不是语言学而是美学，语言学只是翻译学不可或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工具之一，它不能解释翻译学的深层理论问题，具体来说就是(1)意义-意向-形式的多维度语际转换的择善从优问题；(2)意蕴、意象、意境的审美分析与修辞-风格的审美结构分析；(3)词语及文本的文化审美价值分析；(4)翻译的社会功能分析和文化战略评估等等。不仅如此，在实务层面，语言学也不能解决翻译操作过程中多达三分之二的属于语言审美表现的实际问题。当然，语言学是翻译学的“好朋友”、“好帮手”，但翻译学绝对不是语言学的附庸，也更不是只能充当外语语言基础教学的“小伙伴”！

做过五年职业译员和专业汉译英译员的我，到六十岁以后越来越深切领悟到朱光潜教授对我说的一句话——“翻译不能绕开美学”是至理名言。为了论证这句话，我曾经将朱先生翻译的黑格尔《美学》(1981，北京商务印书馆)与原文作过严格的意义和语句安排对比，发现像黑格尔那样的原文，如果译者不是紧紧把握住择善从优的审美原则作审美加工，则今人拿到手里的不啻一部用汉语拼凑的天书！宗白华翻译的康德著《判断力批判》(1964，北京商务印书馆)亦复如此。用本杰明的话说，正是大师们的译作让 19 世纪德国的两大哲人在今日的中国获得了“再生”(after-life)！眼前我们写的这本书——《翻译美学理论》就是我们对朱先生那句话的诠释，这个诠释虽然未必令人满意，但对我们来说，已是恪尽职守了。其实，它远不止我个人对那句话的诠释，这本书里每一条精彩例证的译者——中外古今的翻译大师们都参与了对那句至理名言的诠释。此外，还有为这本书的问世同心协力与我们一起努力工作的同行、同事，他(她)们都以自己的远见卓识无私地参与了对那句至理名言的诠释。

翻译、翻译研究、翻译教学应该在回归到美学的道路上着力于重建，那是整个学科的一种“审美重建”(Aesthetical Remake)。在我看来，翻

译系四年制本科应该有大抵一半属于美学及语言审美课程，另一半属于必要的语言学及其他课程；翻译学的 MA (MTI) Programme 则应该有大抵三分之二的课程属于美学及语言审美课程。所谓“美学及语言审美课程”包括以下四类课程，其中包括所谓本学科必修“核心课程”(Core Courses, 简称 CC, 一共 9 门)和“非核心课程”(Peripheral Courses, 简称 PC, 一共 13 门), 共计 23 门课程:

第一类，实践课程：

- (1) 语言审美与翻译，可分为二级（初级－高级）或三级（初级－中级－高级），属于 CC
- (2) 翻译实务（汉英互译），可分为三级（同上），属于 CC
- (3) 译文典范文本比较阅读与分析，可分为二级，属于 PC
- (4) 英语高级写作，可分为二级，属于 CC
- (5) 第二外语，属于 CC

第二类，理论课程：

- (1) 美学基础，可分为二级，属于 CC
- (2) 翻译美学理论，可分为二级或三级，属于 CC
- (3) 汉英对比与翻译研究，可分为二级，属于 CC
- (4) 翻译概论（一般中西方翻译理论），可分为二级，属于 CC
- (5) 认知心理学概论，属于 PC
- (6) 修辞学理论，可分为二级，属于 PC
- (7) 中英美学名著导读，可分为二级，属于 PC

第三类，美学史课程：均为 PC

- (1) 中国美学史
- (2) 西方美学史
- (3) 中国思想史与西方思想史

第四类，跨学科课程：

A 语言学类

- (1) 普通语言学，属于 CC
- (2) 语义学，属于 PC

(3) 功能语法概论, 以下课程均为 PC

(4) 语用学概论

(5) 文体学概论

B 其他

(1) 符号学概论

(2) 中西方文化研究

(3) 传播学通论

在我看来, 就现代翻译学而言, **翻译美学模式是它的核心模式**, 除此以外, 就目前情况而论, 现代翻译学还有语言学模式、符号学模式和诠释学模式, 一共四个主要模式。也许还可以加上一个当代传播学模式。

为什么“年年喊改进, 年年没起色”? 根本原因就在于将翻译学、翻译研究贴上了语言学附庸的标签! 说句不好听的话, 在国家级的语言专科学校、语言研究所和语言图书馆里, 翻译学和翻译系连“偏房”的地位都不如! 而这一切都是因袭之见的产物, 又被因袭之见层层保护着。按科学分析, 翻译其实仅仅是在语言层面与语言学有“符号共享关系”。在实质层面, 一旦进入意义, 翻译从“全程”到“终端产品”都属于美学, 属于语言审美; **翻译学的全部运作机制集中在两个属于审美的焦点上: 功能上、意义上的代偿和结构上的优化, 正是在这两个决定性的维度上, 语言学对翻译学根本就是爱莫能助!**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语言学学得够多、学习时间够长的学生翻译得并不好的症结所在! 我们一代又一代的翻译教师和译员含辛茹苦, 打拼了几十年, 到现在才明白语言学并不是翻译学的保护伞和万应灵丹, 语言学对我们只有认识论作用和工具论作用。因此, 很清楚, **翻译学、翻译教学、翻译研究势必或迟或早面临深刻的定位改革和归属调整, 那将是一种触及本质属性的改革和调整, 一种世界瞩目的、从学科的定位到内部结构合理化的彻底改革。很可能, 那将是 21 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最精彩、最值得期待的重大改革。**在中国, 从东汉时期算起, 翻译始终在历史定位和归属的边沿徘徊, “谁都要它, 谁都不认它”, 到现今这个终于可以使它回归美学沃土的时代, 总共经历了大约一千八百年的人世沧桑!

在本书出版之际, 我还想借此机会澄清在我看来比较大的几个所谓“个人问题”。

多年来香港和京沪有几个人总是在指责我的理论研究是“搞狭隘民族主义”, 至今还在说我的研究是“陷入了误区”。这些活跃在中国大陆

的翻译专业期刊上的人，在大小会议上散布似是而非的攻击性偏见，却又不提出什么重大论题和科学论证，回避认真的学术论战。

他们的指控使我感到很自豪：能够为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复兴而尽心竭力，使我倍感光荣。就是在四十多年前那些最令人哀痛的迷惘年月，我都没有对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和被恶意抹黑的中华文化失去自豪感。至于说我的理论研究是不是“狭隘民族主义”，我想并不取决于几个人随性的判决，而取决于我是不是在长期的研究和全部著作中固守“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具体讲，主要看我对西方理论是不是采取不分青红皂白一味排斥的态度。

我认为，西方的人文社科理论质量良莠不齐，不能一概而论。西方的理论中凡是对中国的理论建设有借鉴意义的成分我们都应该重视，拿过来经过分析、研究、改造，即将真正有用的成分“本土化”（借用西方的术语就是所谓“归化”）。我反对不加分析地照搬外国理论，尤其反对不顾事实地招摇、吹嘘，为一己之名利夸大它们的实用功能和理论影响。我坚决反对“体”、“用”倒挂，说什么“可以把西方的理论当作中国理论的主结构”来看待等等。说实在的，我在香港和欧美的16年（1989-2006），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研究西方“第一手”理论，以避免自己作出不实判断：近二十年的实地调查和研究，使我对西方翻译界的新旧有关理论已经相当熟悉。西方唯物论哲学和美学经典我大体上很钦佩，就近代、现代和当代而言，我认为维特根斯坦等人的语言观和意义理论、美学理论，功能学派、认知学派乃至结构主义的语言理论，诠释学的一些解释理论，皮尔士等人的符号学理论，当代西方传播学的理解和接受等理论，认知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的语言认知图式和思维模式理论、西方有些现当代美学理论或审美主张，对我们建设中国翻译学都具有或多或少的“可取性”（desirability）或参考价值（advisability），我们应当切实加以研究。西方传统翻译理论和现当代翻译理论也有一些见解可取或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不管西方理论多么可取、多么有参考价值，都需要经过我们“本土化加工”，原因是，西方理论（尤其是社会科学理论）都是西方人文历史、地缘社会和政治现实的产物。一百多年来理论话语权一直被西方所把持，尤其是近五六十年来西方理论的“自我中心化”和排他性、贬他性和泛政治化倾向非常明显而且根深蒂固，要把它用于中国，首先要看看它们会不会“水土不服”，历史教训的恶果至今犹在，无需我来历数。这方面有些当代清醒的中西方历史学家已经大体为我们作了总结，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我这个基本态度以及自己的初步研究，都已写进了我的12本译论著作中。

有论者提出来，之所以有人给我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是由于在我的“非理论话语中，有太多的民族激情”。我不知道这种批评和理论研究有什么关系。在一个历史上被压迫了500年的民族奋起翻身的时刻，谁都很困难木木然躲在阁楼里喝咖啡，而且连手都不抖动！我生来是个血性楚人，实在难以办到。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连一流文豪都蓬头垢面，冲向街头，激动得泪流满面，彻夜不归！读一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激情赞颂，就会体会英国哲学家休谟那句话的真谛：“（发自）理性的情感也是纯净的理性”。其实，在被压迫民族渴望找回自主权的过程中，它的学术界不时释放出的民族主义情绪恰恰是对西方长期的理论话语霸权的一种心理反制。当然，要注意的是必须将这种对霸权的反制控制在“纯净理性”的范围之内。

有件事说来很有趣，但它确实坚定了我的态度。我当年（20世纪90年代后期）无疑是知道大声疾呼要让翻译理论中国化会带来“西方理论的拥抱者们”（我这里是借用西方媒体的用语“Western theory embracers”）的联合反击的。1999年底，我有一位在美国知名智库工作的北大校友来香港度假。我看他热爱翻译，就跟他谈到汉语这个“超级大语种”必须要掌握理论话语权的事。他的积极态度使我深受鼓舞。他对我说，其实西方真有见地的学者并不喜欢人们的刻意迎合，更不稀罕令人不快的奉承，理论界尤其如此。他寄望于我的是，“如果你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要把一种基本理论态度或体系推出去，那就必须采取‘a pushy stance’（强势姿态），容不得半点畏缩，否则对方就会怀疑你的自信心，进而怀疑你的理论态度的正义性和科学性”。临走我送给了他几本我已出版的著作，希望他站在西方理论的立场上加以审视，更不要想到我们之间的校友关系。2001年初春，他从华盛顿市郊给我寄来一封信和一叠合照，信里说“Trust me, I would do the same as you've been doing so far!”（请相信，我也会像你做的那样去做），句子后面还加上了一个大概属于king-size级的惊叹号。我写了封回信，多谢他身处大洋彼岸却仍然保留着这一份可贵的民族情怀。

第二个问题：有人说，我们“没有必要强调翻译理论的中国特色”。

当然，如果大家都有基本共识，确实没有任何必要强调翻译理论的中国特色。但如果没有这种共识呢？不仅没有，而且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乃至波及翻译界的不少“核心期刊”呢？而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其实属于“常识级”。几年来我一直觉得很怪异，中国的史学理论、中国的美学理论、中国的文学理论、中国的艺术理论都在为理论的现代化、本土化

而不断努力，为什么一到中国翻译理论就要开红灯、给黄牌呢？我去过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翻译研究所，他们谈的是美国的翻译理论研究，我去过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大学文学院，他们谈的是欧洲—比利时的翻译理论研究，我去过爱尔兰的都柏林大学，他们谈的是英国—爱尔兰的翻译理论研究。为什么一到中国，就不能谈论中国的翻译理论，不能谈论建设中国的翻译理论，一谈就是走进了“误区”呢？1984年我与朱光潜先生在北京、1987年我与卞之琳先生在香港、2001年我与余光中先生在台北都谈过翻译理论的建设问题，前辈们无不提到翻译理论“要切合自己的情况”、“外国理论必须中国化”、“不要搬洋教条”等等，为什么一到那些反对将外国理论中国化的人那里，很多基本道理都讲不通呢？当然，应该看到，不少人对西方理论有某种热情是出于求知欲和对域外事务的新鲜感，有些人则是出于好奇心或猎奇心，这都是无可非议的甚至应当受到鼓励和引导。但是有极少数人反对提中国翻译理论是假，热衷于中国翻译理论全盘西化则是真。其实这类问题不仅仅涉及理论研究者个人的理论态度。我们是教师，言行势必影响年轻一代。“师有师道，师更有师责”，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以翻译学科和中国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为重。为了避免无谓的纷争，也为了避免“政治性解读”，我现在的根本主张可以表述为“关注翻译理论的中国价值”，也就是回到1987年我在香港大学开会时提到的“Chinese touch”（中国特色、中国色调）。

从国际关系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愿景来看，中华文化和汉语的流通版图将大大扩展、大大延伸，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世界大势星移斗换是历史规律。如果说意大利的维柯（Giovanni B. Vico, 1668-1744）倡导的“历史循环论”纯粹是唯心主义的一厢情愿——细数今日志大才疏的欧洲“列强”，就别再做罗马帝国“转世再生”的白日梦了！但中国从1500年的“历史沉睡”中奋然苏醒，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则是绝对的历史必然（A. Toynbee, 1889-1975）。为什么呢？不用我来解释。中国的生产力和技术潜能从明末（公元1644年）开始已经积蓄了300多年，只要有机遇，这股磅礴的生产力潜能肯定会冲决一切障碍，蓄势齐发！个中道理叫做“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原本是中国唐代诗人刘禹锡对自然规律的赞颂，现在恐怕是全世界头脑清醒的学术界的集体憧憬！

在我看来，我国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终将迎来巨大的改革，这是一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美学转折——翻译学呼唤回归到它的本我。中国教育大厦经历了多年浮躁矫饰之风的吹打，现在但见伤痕累累。因此

彻底改革势在必行。就我个人而论，回顾四十余年的翻译研究和教学历程，最大的遗憾莫过于痛感用在国内博士生培养上的时间太少，用在系统理论探索上的时间太长。恒患有负于诸前辈而岌岌不可终日者，少说也有三十个春秋。实可谓顾此失彼，难得两全。韶光流逝，我心戚然。

另一方面，根据这几年回国的近距离观察，也使我对祖国翻译及外语教师队伍中的许多中、青年优秀人才印象极深。不论从哪一方面看——翻译教学业务水平、科研论著质量和个人品德，他们都不愧为我国翻译教师、外语教师和学术研究人才中的后继之秀。中国翻译学研究和翻译教学界有这样一批中青年英才着实令人非常欣慰！在今天这个唯功利是图的时代，我对他们的学术胆识尤为赞赏。明代学者、文论家李贽说，“盖才胆实由识而济，故天下唯识为难。有其识，则虽四五分才与胆，皆可建业而成事也”（《杂述二十分识》）。李贽所谓“建业而成事”，就是建功立业。中国的翻译事业还需经历重大的改革，我们需要与更多、更多有胆有识的中外老年专家和中青年才俊共同努力，为中国的翻译事业建功立业，打造出一片翻译学的新天地！

2010年春于同济大学同济西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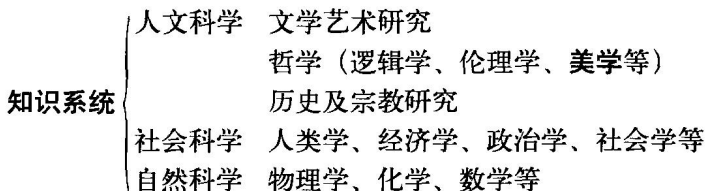
《翻译美学理论》导读

章 艳

一、朱光潜：“翻译绕不开美学”

在许多尚未近距离接触翻译美学的读者心目中，翻译美学如一位严肃冷峻的哲人，让人望而生畏、敬而远之；抑或如一位神秘莫测的美人，美则美矣，却似水中月镜中花，可望而不可及。这些错误的印象使得许多翻译实践者认为，翻译美学关乎翻译中最高境界的艺术性，玄而又玄，对大多数翻译实践并无指导意义。而有些翻译理论研究者则简单地把翻译美学等同于语言审美，以结构主义的静态观看待语言的形式美和语音美表现，只见其“形”而失其“神”，这就好比把富有神韵和立体感的油画变成了虽然准确却只是平面的照片。

要谈翻译美学，当然应该先来谈一谈美学。什么是美学？一般认为，美学是一门研究美、美感、美的创造及美育规律的人文科学。学界公认，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是在1750年，以德国哲学家鲍姆加登(A.G. Baumgarten, 1714-1762)《美学》一书的问世为标志。鲍姆加登注意到，人类的心理结构包括知、意、情三个部分。“知”即理性认识，已有逻辑学研究，“意”（意志）已有伦理学研究，唯独“情”即感性认识却一直无人关注，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知识体系架构中的一个漏洞。1750年，他出版了专门研究感性认识的专著，题为Aesthetica，意思是“研究感性的学科”，即我们今天所谓的“美学”。据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学在人类知识系统中处于以下位置：



可以说，美学不仅不神秘，而且关系到每个人，因为它所关注的情感是人类共通的，任何一个有情感的人都可能与美学有关。同理，翻译